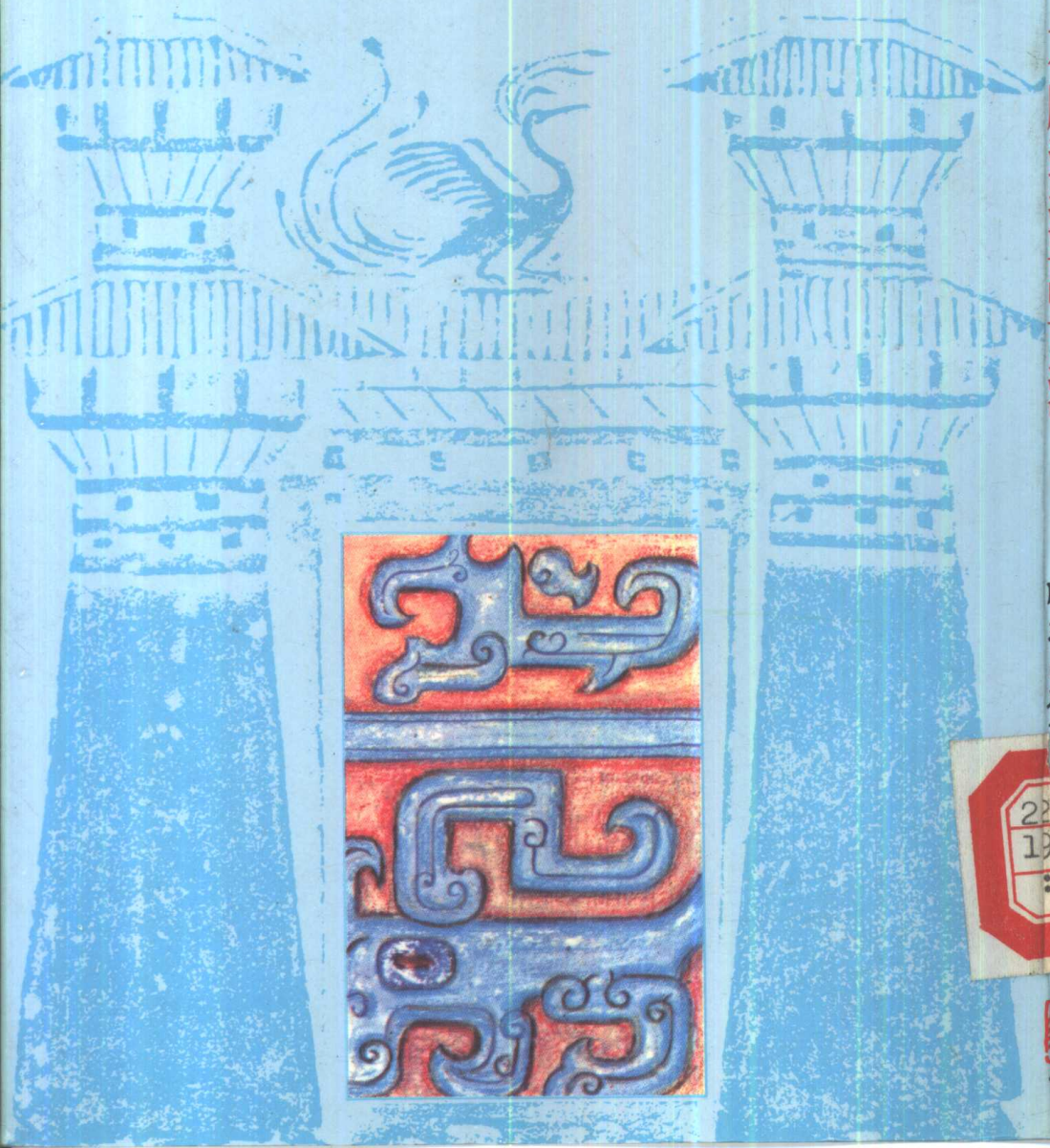


論新化文國中  
篇論序

# 流古萬河江廢不



22  
19  
:

70·9·0500

·6300111·

中國文化新論 序論篇  
不廢江河萬古流

總主編 劉

本冊作者 劉

發行人 王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郵撥：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第五次印行

定價：精裝本七十元  
平裝本四十元

## 目錄

時代環境與歷史研究	一
近百年來的歷史背景與歷史意識	六
文化定義淺釋	一五
一些錯誤歷史概念的澄清	二三
文化史教育與文化建設	五七
中國文化史編撰的新嘗試	六三
附錄：〔中國文化新論〕總目	

## 時代環境與歷史研究

每一代人回顧歷史，都各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因此，每一代人歷史意識的形成、史觀的建立，都往往不能免除自己時代環境的影響。我們研究思想史，常常注意每一個時代的歷史思想，希望在這一代的歷史意識裏，去探尋其對世事人生所抱持的態度，其原因也在於此。就史學的理想境界而言，歷史研究是一種存實求真，以明察人類各文化社會興衰流變的因果、及其發展脈絡的學問；然而，無可否認的，每一代人的時代環境，卻也深深的影響着

這一代人對歷史的態度和情感，更進而影響了他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解釋。

從中西史學的淵源發展來看，這種時代環境、歷史意識、以及歷史研究間的交互影響，並不必然是一個不好的現象。研究歷史的最高鵠的，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每一代人自己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在一個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或重重憂患的時代裏，也常使這一代人對歷史的認識與研究，有着更新穎的眼光，和更深遠的透視，因而能提出前人所不曾提出過的問題，見到前人所不曾見到過的意義。在中西史學史上，超絕一代的史學大師，千古不朽的史學名作，也正多出現於這種憂患殷重的時代裏。其實，我們也可以說，史學原都是孕育誕生在歷史憂患之中。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裏，司馬遷對孔子修《春秋》的時代背景，便曾有一段很好的說明：

上大夫壺遂曰：昔者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從以上這一段記述，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孔子的修《春秋》，與他當時的時代背景，有着密切的關係。感時而作史，這正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中國上古史的發展來看，春秋時代確是一個急劇動變、憂患重重的時代。在政治上，由於周室衰微，王權沒落，擁有廣大封疆的諸侯，相繼崛起，擴張領土，蓄養軍備，以武力稱霸於世，而各國的巨室，也僭越權力，篡弒相仍，在在都破壞了傳統的國家政治秩序和禮制規範。所以，「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而且，在文獻方面，周室東遷後，王室的典籍已經殘缺不全，諸侯各國的春秋史乘，更往往因國亡而失絕。因此，春秋一代，不僅在政治社會上是一個急劇動變的時代，而且，由於文獻的散失，歷史的發展流變更面臨着失實亡真的危險。所以，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又說：「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感世事之激變，慮文獻之散亡，孔子的修《春秋》，真可說是意義深遠的千秋事業了。

在西方，史學的濫觴也與歷史憂患息息相關。紀元前五世紀，與我國的春秋時代幾乎

同一個時期裏，西方的古希臘世界也經歷了一場大變局。在第五世紀的初葉，希臘曾經兩度遭受到東方波斯帝國大軍的入侵；而第五世紀的後半葉，卻又是希臘各城邦間將近三十年的連綿內戰。在兩次波斯大軍的入侵中，希臘人能以少勝多，用自由城邦的精神擊敗了奴役暴力，可說是希臘文化的一場生死存亡的搏鬥；而三十年的帕羅奔尼撒戰爭，卻是希臘城邦間霸權的爭奪，背棄了希臘文化中道的理想，而終將希臘世界帶到了衰微的邊緣。因此，在西曆紀元前的第五世紀，希臘也出現了兩位大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西底德斯（Thucydides）。前者記述了波希戰爭中，希臘人誓死維護自由的英勇事蹟；後者則對希臘各城邦間權力的衝突，以及帕羅奔尼撒戰爭發展的脈絡，作了精闢的分析。

以上的說明，僅以中西史學早期的形成和發展為限。其實，歷代的大史學家，幾乎無不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和激勵。感時而著史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時代環境的影響，如果缺乏嚴謹的史學方法，公正的治史態度，以及精深的歷史研究作基礎，卻也往往會造成嚴重的歷史偏見，反而不能認識歷史的真象。在近代文化的急劇轉變中，由於價值觀念的不同，對事物評判的標準也因而相異，這種因時代環境所造成的歷史偏見，更容易產生，使我們不僅不能再領悟和感受前人的思想和情操，也無法正確的去判斷歷史上各種典章制度的政治功能，或禮儀規範的社會意

義。近百年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裏，便處處呈現出這種現象，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我們在下文中也將有更詳細的討論。在西方，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由於思想文化的轉變，也有同樣的現象發生。而且，這不僅在一般人的意識上是如此，即是在著名的史學家的思想中，也不能全然避免。譬如，十八世紀西方兩位著名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和吉朋(Edward Gibbon)，都是西方史學史上卓然有成的一代大師，然而，他們卻也不能免除由啓蒙時代的思想情感和智識態度所形成的歷史偏見。所以，自十八世紀末期德國的赫德(Gottfried von Herder)，到十九世紀英國的柯靈悟(R. G. Collingwood)，都一再指出啓蒙運動所造成的歷史偏見及其影響。柯靈悟更索性把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史學思想，認爲是一種爭辯性的、違反歷史的思想，而不是研究歷史所應有的正確態度。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意識，尤其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思想，也明顯的是抱持着一種爭辯的立場，而缺乏歷史的同情了解。柯靈悟此一論點，是值得研究中國近代史學思想的人反覆思考的。

無可否認的，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遭逢了一個憂患深重的時代，同時，這也是中國文化本身在急劇變遷的一個時代。近百年來的歷史環境，無疑的在深深影響着近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一方面，這一個兩千年來中國歷史的大變局，激勵了新的歷史研究，提出新問題，探



尋新意義。然而，在另一方面，近百年來的內憂外患，西潮的激盪，文化的劇變，也使我們產生了許多歷史的錯覺。

## 近百年來的歷史背景與歷史意識

自從清季末葉以來，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古老的中國文化遭逢了一次亙古未有的雙重危機。從外在的世界環境看，這正是近代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力量蓬勃興起、迅速擴張的時代；而這西方勢力的東來，又恰巧是中國的滿清王朝衰替沒落的時侯。西方勢力的入侵，和滿清帝國傾覆前後所造成的昏庸腐敗、紛亂錯雜的勢局，交織成近代中國政治社會史上一頁黯淡而令人悲憤的歷史。在另一方面，從近代中國人內在的思想意識看，這一段的歷史經驗，更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忘卻的沉痛創傷。在歷史上，中華民族原是一個歷經憂患的民族，而中華民族所創造出的文化世界，也並不是一個生長在歷史暖房中的文化世界。在過去，中國也曾屢次經受外來勢力的侵擾，然而，中國人——有志節的中國文化人——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和價值，卻從未失落過信心。相反的，每當中國文化社會遭逢侵擾和危難的時候，總有一些堅毅不拔的志士仁人，服膺着多難興邦和生於憂患的傳統歷史信念，在橫逆困危的環境裏，努力重建國家的政治秩序，維護社會的禮俗

規範，傳遞先人的學術智識，綿延民族的文化生命。然而，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的一場歷史變局，卻在許多中國人之間，尤其是許多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間，造成了對民族文化信心的動搖和失落。

西方列強勢力東來所構成的危機，畢竟是威脅着中國文化世界的外在力量，而且，外在的危機，隨着整個世界形勢的消長流變，會漸次在歷史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消失。我們以近代西方國家勢力的東漸為例。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葉，從非洲沿岸，通過印度洋，而直到南中國海域所建立的海上帝國，實際上到十六世紀末葉已逐漸走向沒落。在同一時期內崛起的西班牙王朝，從斐迪南 (Ferdinand) 和依薩伯拉 (Isabella) 到菲利普二世 (Philip II)，不僅武力雄視歐洲，而海外領土的擴張，更自新大陸直到東南亞的菲律賓羣島。然而，到十七世紀中葉時，西班牙王朝也已經明顯的走上衰替的道路。在十七、十八世紀以後相繼興起的荷蘭、英、法、德、意等西歐國家，到二十世紀的前半葉，經過了兩次歐戰的烽火劫禍，隨着亞、非和中東舊殖民地及附庸領土的喪失，也都漸次在世界舞臺上退居於次要的地位。半世紀前日不沒落的大英帝國，今天已岌岌不保英國王室傳統領土的完整。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美、蘇兩大強國而言，由於三十年來整個世界政治形勢和經濟結構的演變，在戰後國際權力上所形成的兩極形勢已不復存在。而且，在蘇俄的共產主義帝國內，東歐附庸

國家的人民，在南斯拉夫、在匈牙利、在捷克斯拉夫、在波蘭，爭取國家獨立、自由人權的浪潮，已洶湧不可抗拒；而蘇俄內部少數民族及反共闘士們的不滿情緒，更是蘇俄帝國終將毀滅的徵兆。因此，我們從近代世界歷史形勢的消長流變看，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世界所面對的外在危機，畢竟都終會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消失。何況，多難興邦，對於一個尚未失落民族文化信心的國家，外來的憂患，卻更能激發其文化的創造力，而促成民族的復興。

然而，一個民族若對本身文化喪失信心，因為惑於一時的時代環境的影響，而產生歷史的偏見與錯覺，以致於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真實面貌及其內在的精神，不能再有完整的、不偏不倚的認識和領悟，這樣便容易造成歷史意識的錯亂。而歷史意識卻又是影響每一代人思想和行爲的巨大力量。因此，錯亂的歷史意識，往往會形成思想上和行爲上的狂風驟雨，把一個文化世界的事物摧殘得花果飄零。

十九世紀的歷史經驗，像是一個濃重的陰影，籠罩着近代中國人的心靈。堅船利砲的震盪，割地賠款的屈辱，亡國滅種的憂憤，在多少中國人的心靈上鑄下了一個糾纏難解的情結——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意義的懷疑和批評。近代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幾乎與這一個歷史意識問題不可分割。從清末自強運動的初期，到民國初年的中西文化論戰，一直到近三十年中國大陸上的一場文化浩劫，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近代中國人這種歷史意識的形成與發

展。而且，這種心理上困擾的情結，往往變成一個人觀察和判斷一切事務的執着點。因此，當我們透過十九世紀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心理情結，去觀察和評價中國文化社會時，又怎能不懷疑中國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在十九世紀歷史經驗的陰影裏，中國文化的精神的理想，又怎能不失去其原有的光彩？

十九世紀美國的作家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他著名的小說〔白鯨記〕(Moby Dick)一書中，曾描寫愛赫布船長(Captain Ahab)在那追逐白鯨的漁船桅桿上，釘上一塊金幣，金幣上鑲刻有各種不同的符號和紋飾。這塊金幣原是愛赫布船長答允給予第一個發現白鯨的水手，作為特殊的獎賞。然而，每一個水手卻在這金幣的符號紋飾中，各自發現了不同的意義。愛赫布船長曾巧妙的解釋說：「這塊金幣是圓圓大地的象徵，但它卻像一個魔術家的一面鏡子，對每一個人都反映出他神秘的自我」。這是一個頗為耐人玩味的比喻。對於某種人而言，歷史也正像這樣的一面鏡子，這種人在歷史中去尋找到的，常常並不是歷史的真象，而卻是他們本身自我心態的反映。

在本節中，我們對近百年來中國人歷史意識的形成，以及它在近代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影響，僅能簡略的加以描述。不過，筆者卻深切的相信，這是近代中國思想上所面臨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某種意義而言，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文化所秉持的態

度，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對中國文化反歷史性的批評，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共「文化大革命」中對中國文化的全面背棄和摧殘，可說是這種歷史意識的心路歷程。然而，我們應該指出，十九世紀的歷史經驗，只是歷史上一時的現象；我們不能以一時的經驗，去評價一個古老文化的整體價值和意義。如果我們借用一下荀子的話，我們可以說，這種歷史意識，實蔽於歷史的「變」而不能知「常」，蔽於歷史的「剝」而不能知「復」。在史學方法上，用現代的觀念去批判歷史事物的價值，原已是一種錯謬的治史態度；倘若人們將自我心境的反映，誤認為是一個民族文化世界的真象，那又如何能不造成錯亂的思想和行爲？其實，我們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化史，應該能使我們自己變得更加敬慎與謙遜。一個民族文化世界的創造，總是經過幾千年先民智慧漸次累積而成。背棄了這幾千年綿延發展的民族文化生命，所遺留下來的只是一個個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個人而已，生命中的文化內涵將會變得那麼淺薄和貧枯。

十九世紀瑞士著名的文化史學者柏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指出，在近代歷史上，由於各種狂熱的社會革命運動所宣傳的意識型態的影響，一些人們思想上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便是認為一個新社會的創造，可以把過去的文化傳統毀滅，而在歷史文化的廢墟裏，或者說在一片空白的歷史白紙上，再由他們的手中去重新建造起來。然而，這種狂熱的

心態，實在並不了解一個文化社會成長發展的性質與過程。人類每一個高度的文化社會，從蠻荒的原始到高度文明的形成，都是經過多少世代的智慧和心血不斷培育的結果。無論在政治制度的建立演進上，思想情操的拓展凝煉上，科學工藝的發明製作上，藝術文學的創造表現上，都不是任何一個人，甚或任何一代人的心智才可以取代的。牛頓 (Isaac Newton) 在他劃時代的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 一書的序文中，特別聲稱在科學的成就上，他只不過是站在前代巨人們肩頭上的一個矮子而已，便是最好的一個說明。牛頓可說是一個對人類文化學術的發展，有深刻了解的學者。文化的成長發展，一方面需要各世代的創新，另一方面更需要一代一代的累積與傳承。所以，柏克哈特認為，對文化傳統的背棄，即無異是走向野蠻。

柏克哈特是一個博學多識、特具慧心的學者，更是十九世紀中葉研究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史學宗師，當然不會輕易的妄作驚世之言，以駭人聽聞。其實，對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而言，只要回顧一下近百年來中國人歷史意識的發展流變，以及其在思想上和行爲上所帶來的紛歧狂亂的現象，則柏克哈特的此一論點，也許更是值得警惕的一記當頭棒喝。目觀近三十年來，中國傳統的文化社會，在中國大陸上所遭逢的一場浩劫，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中國文化在歷代所遺留的歷史文物，深植於中國人之間的社會秩序和人倫規範，兩

千年來中國人所奉持的一些基本思想和信念，以及那凝聚和蘊藏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文化情操，都受到了狂熱的全面摧殘。而中共政權曾熱切期待和歌頌的「新生事物」，卻都是些絲毫沒有文化價值、而只能短暫存在的東西，他們所企望的一個嶄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世界，始終連海市蜃樓的幻象都不曾出現，留下的只是三十年愚昧、狂熱、破壞、混亂所造成的山河廢墟，這怎能不令人敬佩柏克哈特的歷史慧識？

當然，這一場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狂濤巨浪的形成，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馬克思的歷史思想及共產主義的狂熱本質，中共政權的暴戾性格及其內在權力鬭爭的延伸，都是構成這場浩劫的主要力量。然而，從較長遠的歷史角度看，我們怎能說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普遍流行的錯亂而狂熱的歷史意識，沒有深切的關係？遠在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三、四十年間，一條一條反中國文化的潛流，早已出現在近代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裏。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中，人們用「封建餘孽」形容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用「吃人禮教」描述中國舊有的人倫規範和社會禮俗，用「孔家店」概指中國人的基本思想和信念，都可說是這些潛流在初期激盪而成的浪花。這種反中國文化的歷史意識，也許在這一時期的新文學中，表現得最爲生動，影響也最爲深遠。譬如在這時期的小說裏，處處充滿著狂熱奔放的革命激情，以誇張舊社會的罪惡爲主題，以反叛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爲宗旨。魯迅的《阿Q正傳》和《

狂人日記》，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便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作。這些作品在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中間，風靡一時，造成了一個波瀾洶湧的狂潮。今天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這段歷史往事，應該記憶猶新。筆者不研究中國近代文學或文學批評，不願對這一代新文學的意義和藝術價值，妄作批評。我們所注意的是這一代新文學中所表現的歷史意識。不過，筆者大學時代的同學白先勇先生，是當前一位著名的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在國際間知名的、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學者，他在討論中國近代小說時也曾說：「環顧世界各國，近半個世紀以來，似乎還沒有一個國家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如此仇視憎恨，摧毀得如此徹底的。」這應該是一個公正的論斷，與我們的分析可以相互印證。

在這裏，我們必須說明，在本節中我們對近百年來時代環境和歷史意識的分析，只是將這一個歷史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當作一個歷史現象作客觀的分析。我們無意重新掀起和參與一場文化的辯論，更不是對前人的思想作道德的價值判斷。其實，他們也還是出於愛國情操。我們無寧是以同情的治史態度，去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歷史意識形成的背景和過程，以及它是否能正確的認識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無論是思想、文學、藝術、或科學，一個時代對傳統的自我省察和批判，原是一種健康的和進步的徵兆。然而，對一個文化傳統抱持著仇視和憎惡的情緒，以至於希望全然背棄和摧毀這一個傳統，則是一個極其少



見的現象。而且，這不僅是不正常的歷史態度，更與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眞正性質相背謬。一般人常認爲西方近代社會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是由於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近代科學的興起、以及啓蒙運動等歷史事件，背棄了歐洲中古的基督教文化傳統，摧毀了中古政治、社會和思想的重重枷鎖，而重新建立了現代文化。其實，這是一種極其淺薄錯謬的看法，既不了解這些歷史事件的眞實性質和意義，更未認識西方近代史發展的眞實過程及其脈絡。這些問題，屬於西方文化史的範圍，在本節中，我們無法作更廣泛深入的討論。不過，我們應該指出，這卻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意識的另一層假想的基礎，但這個基礎也只是一片幻想，並沒有眞實的存在。

在歷史上，往往會有許多思想潮流，世事動變，似總要發展到一個極限後方逐漸消失。古人所謂「氣數使然」，似即是指這種歷史情景。一般人也常說，在歷史的消長流變中，剝極「必」復，而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剝極「始」復了。三十多年來，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這種反中國文化的歷史思潮，眞可說發展到了巔峯極限，卻也把整個民族帶到了野蠻的邊緣。雖然中共政權迄今猶徬徨在歷史的歧路上，而大陸人民對民族文化剝極思復之心，則已呈現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景象。因此，無論從那個角度看，現在該是近百年來，我們重新去認識中國文化最適宜的時刻。